

钟嵘《诗品》三品论诗背后的门第家学逻辑

叶冰仪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 850000

【摘要】：钟嵘《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著，将汉魏宋齐梁时期的百余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卷，进行分品论诗，影响深远。本文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的兴衰，探究诗人品级其与家世及家学渊源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诗品》三品分别承载着钟嵘不同的诗学理想，体现了其以诗学审美为主，辅以门阀谱系、家学源流、政治文化身份的复合分品标准。三品论诗不仅暗藏着钟嵘对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兴衰变化接受的结果，还体现出其试图维护士族文化利益的意识以及门第家学的现实考量，故《诗品》有一种“史”的眼光。

【关键词】：钟嵘《诗品》；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三品升降制度

DOI:10.12417/3041-0630.26.09.070

关于钟嵘作《诗品》评诗是否涉及门第观念，大致分为几种，有的如范文澜先生、曹旭先生、梅云生等赞钟嵘态度持正，褒贬无私，没有门第偏见；另一些学者如葛志伟，认为其出身士族，处于南朝高门和寒势夹击之中，是主观上为了维护士族利益而作。钟嵘身处齐梁之际，魏晋门阀士族势力逐渐变小，寒门势力与日俱增，一些门第分级观念正在各种文化领域发生变化，虽衰犹盛，势必是会影响钟嵘的意识形态。笔者以为，钟嵘在《诗品》中留下门第家学逻辑的痕迹主要体现在三品升降机制上。上品多为高门、文学世家的子弟，钟嵘褒扬其诗风的同时肯定了文学世家所传承的文学传统，与其是否歧视寒士庶出无必然矛盾，仍然可以承认其评论诗歌的意图是褒贬无私的。

1 魏晋门阀制度的兴盛：钟嵘士族意识与分品概念的渊源

中国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度出现，门阀政治随之逐渐发展壮大。到了两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士族势力权倾朝野，门第阶级观念直接笼罩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圈的方方面面。门阀制度几乎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一同动态发展，随之还有世家大族的兴盛，一些累世公卿的姓氏大族就会表现出明儒术、掌礼法、累高官与厚禄的复合型贵胄巨族之态。名门望族对辨悉家族来龙去脉、支派分合、等级差异等工作的深度需求，直接带动了谱牒修撰的高峰、谱学快速发展。由于晋末出现新兴士庶不择手段要求跻身谱牒，谱牒编撰走向专业化、官方化和家学化，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特权的象征。

门阀政治进一步使得文学传统与家族声誉融为一体，文学与家风直接挂钩，久之，名门大姓发展成文学精英集团，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等，累

世皆有以文名家者，出现了众多借助文学来追缅宗祖和标榜世类的士族文人，如潘岳和陆机，庾信在《哀江南赋序》表达过：“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

以上提到的九品中正制度、谱学、文学世家，无疑是探究南齐钟嵘创作《诗品》的时代背景的重要因素。

进入南朝，皇权强化，寒人势力得到发展，当时因谱牒讹误、庶人冒充冠族等原因而造成了铨选失次的状况，使得士族的势力和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损。经济势力逐步减弱，但士族政治的社会风貌尚存，文人名士也仍讲究士庶之别，谱牒、选簿、胄籍是当时社会区别士庶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情况下，值南朝齐梁之际，钟嵘出身颍川钟氏世族，兄与弟皆有“学在家族”的著述传统，祖上研究易学成为家学特色，同时钟嵘师从谱学巨擘王俭，种种之下，钟嵘如何不受时代的影响？对此，葛志伟先生对记载于《梁书·钟嵘传》和《南史·钟嵘传》等文献上的关于钟嵘“上书齐明帝”和“上书梁武帝”二事前后的考释，明确揭示出钟嵘两次上书的背后是维护士族群体利益的思想立场。“钟嵘撰写《诗品》表面上是为了给年轻的士族子弟在五言诗创作上提供‘准的可依’……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占有这种文化资本，进而维护士族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只是与两次上书相比，钟嵘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在《诗品》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故以族望家学士庶分人之高下的分品观念、借助谱学定宗溯流的理念维护士族利益的意识，均在钟嵘《诗品》得到了体现。

魏晋文学主体是诗歌，四言诗占据正统地位，五言诗方兴未艾。进入两晋南北朝，越来越多文人创作五言诗，从形式、内容、声律甚至经典化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但从观念上，五言诗未真正得到正统雅化，尚且被视作文人自娱之作。钟嵘就很

作者简介：叶冰仪（2005年2月28日），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广东省中山市，学历：大学本科，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可能出于维护和发展士族文人在五言诗创作方面积累的优势，循着前辈挚虞《文章流别集》开出的流别传统，以及接下江淹杂拟（梳理出大致时间脉络）、刘勰《明诗》（认李陵为五言之祖）、沈约评赋（道出五言宗法诗骚传统）的接力棒，把五言诗经典化的谱系路线走了下去，成功抢占制定标准的先机，作《诗品》完成对五言诗流派谱系首次的建构，为五言诗源于诗骚传统、明确五言诗文学史地位作了坚定阐释，极具历史眼光。

分品论人之风，早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开其先，曹魏时期门阀士族的九品中正制把分品论人上升到权力政治层面，下至齐梁，谢赫有《画品》、沈约有《棋品》、庾肩吾有《书品》，文论方面钟嵘《诗品》的出现其实就是历史所趋。

2 《诗品》三品论诗潜在的门第家学逻辑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奕。”钟嵘认为，九品的门阀制度官员选举、七略由书籍分类衍生的人才审定体系，大多重门第家学，脱离实际才学，品不配位。与之类推，论诗的分品体系，诗人写的好不好，自有世人和文人之间互相欣赏比较而定夺。从《诗品·上品序》可知，钟嵘不满前代文论著作“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以及“曾无品第”。综上，钟嵘采用三品论诗来显示优劣，其直接源于曹魏九品中正制度“分品论人”，与《七略》“分门别类”以及门阀谱牒“辨宗流、定世系”同构；同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掩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说明钟嵘是一个有理想、有个性的诗学批评者，他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想淋漓尽致地在《诗品》的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以及具体的品评之中，上中下三品的诗人名单是他对时代精神、诗学传统、审美理想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收录一百二十人，公正无私，无门第偏见，涵盖高门与寒士。

《诗品》三品升降标准不只依附名声、门第、身份的高低，无门第偏见和歧视，却并不意味着钟嵘没有考虑门第家学本身对文学审美价值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诗品》三品升降的依据是以诗学审美为主，辅以门阀谱系、家学源流、政治文化身份的复合评判。

对于梅运生先生认为“钟嵘虽出身于士族，但没有把门第偏见带进诗歌评论中来，他无所忌顾地直言批评当代的贵公子孙和文坛上的宗师，把他们列在中品和下品也能拔掖寒素，敢于肯定‘人非文是’的诗作”的观点，笔者是十分认同的，必须指出的是，钟嵘的诗歌评价体系虽无门第偏见歧视，但存在门第家学的价值判断。钱穆先生曾论，魏晋南北朝学术的特点和世家大族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

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

故笔者认为，《诗品》上、中下品实则分别承载了钟嵘不同的诗学理想。

上品11位诗人及古诗（十九首），乃钟嵘尽情展现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诗美理想之处，融合了其对名门世家的文学传统的褒扬。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子弟来自地方世家大族，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儒术、礼法、文学、史学等良好的家教，许多文学世家如三曹、诸阮、三张、二陆、王氏、谢氏等在文人圈属于令人仰慕学习的存在。上品除开古诗，共11位诗人，通过分析其朝代、重要籍贯、政治背景以及钟嵘所写评语，不难发现，上品诗人除左思外均为士族，不论侨姓、吴姓。

其中，李陵、班婕妤都是汉代上层世家，扶风班氏属于后代门阀士族前身阶段，奠定了一定的五言诗“高门传统”；曹植、刘桢、王粲属于曹魏时期建安七子，均为高门文宗子弟，是钟嵘所推崇的建安风骨的代表，分别为《国风》和《楚辞》诗骚传统的流脉。其中，“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说明曹植是钟嵘心中“风力”与“丹彩”结合、突出雅怨神风的诗美理想的最高典范，刘桢可登堂次之，西晋三家陆机、潘岳、张协再次之；阮籍为竹林七贤之首、正始之音，陆机为太康之英，代表着建安风骨渐弱到两晋南朝辞采取胜、诗坛力量从北方到中原的过渡变迁；潘岳和张协的诗风已然无建安风骨，却是钟嵘诗美理想中单项“丹彩”的典范；左思为建安风骨遗存，凭怨刺和风力诗艺取胜，为上品唯一寒门，体现钟嵘诗美理想中单项“风骨”的典范；谢灵运是南朝顶级侨姓，其诗为南朝诗风声色大开的典范，辞采富艳繁芜，体现了钟嵘心中南方诗风“华美清绮”的家学巅峰。综上，上品诗人是钟嵘心中五言诗明珠中的明珠，典范中的典范，是“显其优劣”中的顶优之人——不仅是诗艺顶绝，更是家学传统积淀最丰厚最顶绝的代表。

另外，钟嵘在《诗品·卷三序》尾段一共提及20位诗人加诗作内容简称，并下结论“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这直接表明了哪些才是他心中最贴近感荡性情作诗、兼具风骨与丹彩的诗美理想的五言诗创作者。其中有“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谢客山泉”，有10位都是上品诗人，占了一半，另外诗人皆为中品。值得一提的是，上品唯一一位出身寒门的左思，却独独在此处没有被提及，“文典以怨，颇为精切”，证明钟嵘的确赏识左诗有风骨、得《诗》风雅怨刺之精神，称其“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野”字可谓暗示了钟嵘诗学标准中的门第家学理念。因当时文学创作、审美话语权被高门士族垄断，

寒门子弟接触的诗学资源杂乱不精、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与熏陶导致作诗质量不高、诗作难以留传，故寒门文人极少名人佳作入品。上品有左思一例，说明左思以诗艺取胜、钟嵘定品以诗美标准为主，但此处独未将同为上品的左思列入“五言之警策者”“珠泽”“邓林”之席，也说明了钟嵘三品论诗的家学门第逻辑。

中品与下品，多为中等士族、寒门势族，亦是他经过精心筛选出来的五言诗之明珠。但诗风走向“清”系（清省、清靡、清丽、清拔、清浅），有的滑落东晋“寡淡无味”的玄言之风。只有中品偶有“感恨”的刘琨、“慷慨”的郭璞游仙诗、“质直”的陶渊明咏贫诗、“绮丽”的谢惠连捣衣诗、“骨节、驱迈”的鲍照戍边诗仍存几分风骨怨刺之美，是钟嵘认为可溯其

流、可圈可点的存在。此二品对于家学门第的考量明显大大淡化了，各种门第背景、地域文化的诗人均三五合并一起，进行总述评价，纯以诗艺取胜、以代次分先后。

《诗品》的三品层级并非单一审美维度的简单划分，是一种以诗学审美为主要、辅以门第家学、文化积淀的综合评判。钟嵘的三品论诗范式，既折射出其对魏晋以降士族文化兴衰流变的历史认知与接受积淀，也暗含其维护士族文化传统、兼顾门第家学现实格局的批评立场与价值考量。由此可知，《诗品》的品评体系并非单纯的文学批评标准，更兼具宏大的历史视野，在品诗论艺的同时，客观记录并回应了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更迭、文坛格局变迁的时代进程，具备鲜明的诗史互证特质。

参考文献：

- [1] 赵静.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1.
- [2]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1-199.
- [3] 王永平.论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风与家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1,(5):150-155.
- [4] 周唯一.南朝士族治学管窥[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67-72.
- [5] 葛志伟.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J].社会科学论坛,2014,(1):58-67.
- [6] 何忠盛.官学沦废与家学兴盛——试论魏晋南北朝的学术传承模式和人才培养机制[J].中华文化论坛,2015,(3):91-96.
- [7] 丁涵.论两晋南北朝谱牒修撰与家世文学书写[J].文学遗产,2020,(6):29-41.